

新 中 學 文 庫
商 鞅 評 傳

陳 啓 天 著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著者 陳啓天
主編者 王雲五

國學
小叢書

商

鞅

評

傳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五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三月三版

(90401)

國學叢書
商鞅評傳 一冊

定價國幣貳元伍角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版 翻
權 印
所 必
有 究

著 者 陳 啓 天
主 編 者 王 雲 五

發 行 人 朱 經 農
上海河南中路

印 刷 所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發 行 所 商務印書館
各地

謹以此書紀念

先父陳公子俊

敘

商鞅爲何等人物，古今評論，紛紛不一。特爲其作傳者，前有漢司馬遷，後有清麥孟華而已。太史公之作史記也，爲鞅作專傳，記其變法之原委甚詳，然譏其刻薄少恩，遂使後世但疑其爲無情之人，而不知其變法之重要。清季梁任公編印中國六大政治家一書，以管子爲第一編，由任公自撰；以商君爲第二編，由麥孟華撰之。於是商鞅之價值與地位，乃稍明於世，不復爲前人之譏評所囿矣。然惜其書既已絕版，而其取材與夫論斷，亦未能盡當人意。予校釋商君書既竣，乃參稽羣籍，重行考定。商鞅之價值，而成此評傳一書，然後此大政治家之真面目，及其與中國歷史之重大關係，庶可盡明乎！書中所引證者，俱詳注出處。至引證商君書之文，則以予之商君書校釋爲本。屬稿之初，得至友數人分在北平杭州南京廣州等地代搜必要之參考書，使是書獲早日告成，是則宜深深誌謝者也。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國難紀念前七日

陳啓天敘於武昌

目錄

敘

第一章 商鞅的時代概況及其傳略

一 商鞅的時代概況

二 商鞅的傳略

三 商鞅的年表

第二章 商鞅的法治主義及其學說

一 變法的根據

二 任法的理由

三 壹刑的重要

四	重刑的主張·····	三二
五	明法的方法·····	三七
六	法權的獨制·····	三九
第三章	商鞅的軍國主義及其兵略·····	四四
一	尙力的學說·····	四四
二	尙武的教育·····	四九
三	壹賞的方法·····	五〇
四	社會組織的革新·····	五三
五	軍事制度·····	五七
六	政略與兵略·····	六〇
第四章	商鞅的重農主義及其田制·····	六三
一	重農的理由·····	六三

二	重農的方法	六七
三	田制的改革	七二
第五章	商鞅的政治改革及其評價	八一
一	商鞅的政治改革	八一
二	商鞅的評價	九三
第六章	商君書的考證	一〇六
一	商君書的歷史考察	一〇六
二	商君書的真僞問題	一一三
三	商君書的各篇分析	一二二

商鞅評傳

第一章 商鞅的時代概況及其傳略

一 商鞅的時代概況

一個大政治家的產生，必在大變化的時代。一個人要能成爲大政治家，又必須認清時代大變化的情勢，並抓住致力的要點切實貫徹下去。商鞅是個大政治家，誰也不能加以否認。那末，這個政治家所處的時代，究竟是怎樣一種情勢呢？要解答這個問題，可分兩項說明如下：

一、由春秋到戰國的主要歷史趨勢——春秋時代原指自周平王四十九年至周敬王三十九年中的二百四十二年，以孔子所作的春秋起訖而定。春秋終了，至秦統一六國，則爲戰國時代。現依

王桐齡的分法：以平王東遷以後，至七雄對立以前，即民國紀元前二六八一至二三一五年，共三百六十六年間，爲春秋時代；以韓趙魏列爲諸侯，成七雄對立局面以後，至秦始皇滅燕以前，即自民國紀元前二三一四至二一三三年，共二百八十一年間，爲戰國時代。（參閱王桐齡中國史第一編）商鞅所生的時代，即承春秋之後，正當戰國之初。他於魏列爲諸侯後四十二年，即民國紀元前二二七二年入秦變法；未入秦前已在魏作官若干年。由春秋至戰國，是大變化的時代。商鞅便處在這個大變化的潮頭，努力用新法促進大變化的完成。爲什麼說由春秋到戰國是大變化的時代呢？顧亭林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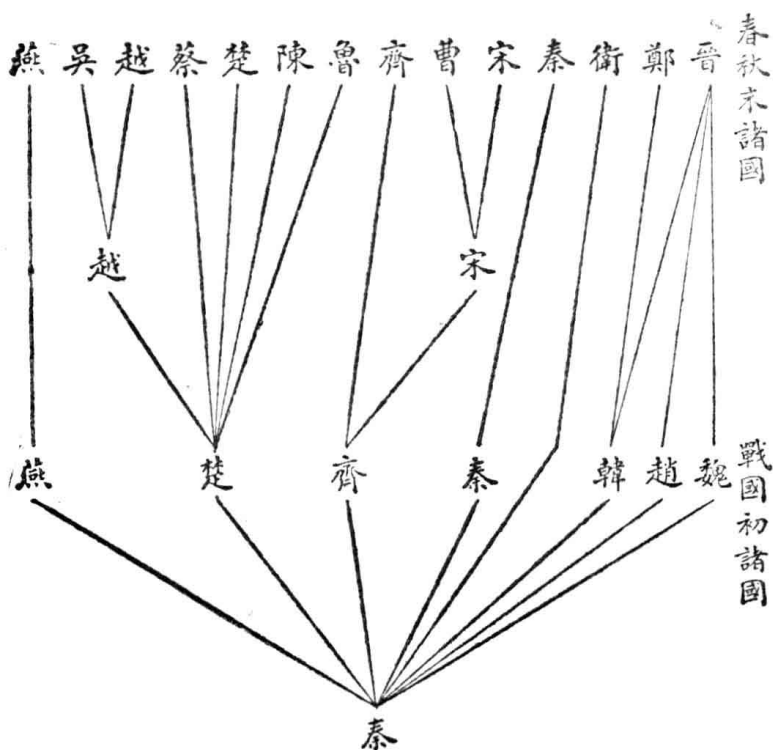
春秋時，猶尊禮重信，而七國則絕不言禮與信矣。春秋時，猶宗周王，而七國則絕不言王矣。春秋時，猶嚴祭祀，重聘享，而七國則無其事矣。春秋時，猶論宗姓氏族，而七國則無一言及之矣。春秋時，猶宴會賦詩，而七國則不聞矣。春秋時，猶有赴告策書，而七國則無有矣。邦無定交，士無定主。——此皆變於一百三十三年之間，史之闕文，而後人可以意推者也。不待始皇一并天下，而文武之道盡矣。（見日知錄）

由顧亭林的意推，可知由春秋到戰國的變化甚大。其實春秋時代比較西周時代已有變化，戰國時代不過繼續春秋時代的變化，更加加速而已。春秋時代因緊接西周時代，雖有變化，尚能保存一點遺風和遺形。到戰國時代，因政治的根本已經蛻化，西周的遺風和遺形便不能保存了。由春秋到戰國的大變化之主要歷史趨勢，不外由西周的封建貴族政治變到秦皇的君主專制政治。此種變化的趨勢，由春秋發端，到戰國完成。推進此種變化的重要原因，約有四種，第一種重要原因，由於列國兼併戰爭的盛行。春秋戰國均是長期戰爭時代，戰爭的結果，弱小的國家常被強大的國家所兼併。於是原來封建的國家一天少一天。周初武王觀兵孟津，與會的諸侯有八百。及勝殷紂以後，又大封同姓和勳戚等人列爵分土，計兄弟之國十五人，同姓之國四十人，異姓之國二十人，連原有諸侯和新封之國，共將一千。然到春秋初，見於載記的，已不過一百六十三國。經過春秋時代的互相兼併，剩下的國家不及一百。到戰國初期，只便剩七雄和數小國。再到戰國末期，則大小諸國均一統於秦。在春秋戰國長期兼併戰爭中，所有周初封建的國家，均因戰敗相繼淪亡。自然原有的封建政治不能保存，原有的封建貴族也不能生存。統一六國，結束封建的秦國，尚是崛起西北，而非周初所

封建。春秋戰國中的大小戰爭極多，不能細述。現只就春秋末至戰國末，兼併的結果。表列如下，以證明此時代的主要歷史趨勢，是由列爵分土的封建貴族政治，進到中央集權的君主一統政治。

第二種重要原因，由於列國內亂的迭起，自平王東遷以後，封建共主的周室固失其權威，而列國

戰 國 兼 併 表



的諸侯也多因「陪臣執國命」，不能保其尊嚴。於是封建時代所最重的名分問題，因列國內亂相繼迭起，完全混亂。從前的人以爲孔子所作的春秋是專道名分的史書。孔子何以要作春秋以道名分呢？正因爲春秋時代所謂亂臣賊子已經不少，孔子眼見不慣，又無法制裁，只得用筆削的春秋去正名分。自周幽王十一年至周敬王四十一年，臣弑君子弑父的事件計有三十八件之多。（詳見王桐齡中國史第一編春秋弑逆表）其後像這一樣的內亂事件，也不在少數。春秋末，三桓擅魯，田氏奪齊，三家分晉，都是著名的內亂事件。到了戰國時代所謂七雄，多不是周初原來封建的國家。這樣一來，從前世官世祿的封建貴族便漸次失其憑藉而歸於沒落。同時列國君主也多感於貴族專擅的危險，而趨向集權專制。所以可以說內亂也是促進這個時代大變化的一個重要原因。

第三種重要原因，由於商工勢力的興起。春秋以前，經濟權與政治權完全合一，即封建貴族一面握有分土以內的統治權，又一面握有分土以內的土地權。貴族以他的封土分授農奴耕種，形成一種井田式或莊園式的農村自足經濟。但到春秋以後，因農業生產的進步和列國交通的頻繁，引起交易的需要。於是商工勢力漸漸興起，幾可與政治勢力對抗。這可以鄭子產與韓子的一段談話

作證如下：

韓子賈諸賈人，既成賈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子請諸子產曰：「日起請夫環，執政弗義，弗敢復也。今賈語商人，商人曰：必以聞，敢以爲請。」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藿，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買，毋或匄奪，爾有利市寶賄，我無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於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強奪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見左傳魯昭公十六年）

由子產的話看來，可知民國紀元前二四三七年，即周景王十九年以前，鄭國與商人間已有商業自由的盟誓，貴族不能「強買」，也不得「與知利市寶賄」。這就是商工勢力興起的鐵證。史記所載春秋戰國間以商工成名的數人，也足爲證如下：

范蠡以陶爲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居……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子孫修業而息之，遂至巨萬。（見貨殖傳，下同。）

子貢廢著鬻財於曹衛之間。七十子之徒，賜最爲饒益。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

國君無不與之分庭抗禮。

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夫歲熟，取穀，予之絲漆蠶；凶，取帛絮，與之食。……趨時若猛獸，摯鳥之發。……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

猗頓用鹽鹽起，而邯鄲郭橐以鐵冶成業，與王者埒富。

商工勢力，既可與國君抗禮，又可與王者埒富，便一面用經濟的方法，分解封建的農村基礎，一面用政治的方法，壓倒封建貴族的權威，致使分治的封建政治，更益趨於集權的君主政治。入了戰國以後，因都市的大發達，（最著名的都市如秦的咸陽，趙的邯鄲，魏的大梁，和齊的臨淄）商業更隨着大發達。戰國的學者和執政，雖多主張賤商重農，然其勢力終不可遏止，極似晁錯所說的情形如下：

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農夫之苦，有仟佰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

人，商人已富貴矣；貴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見前漢書食貨志）

量錯所說，雖指漢初的情形，然此種情形實自戰國演進而來。這種經濟上的新興貴族，與舊有的封建貴族利害衝突，勢難兩立。新興貴族竟能以其富厚的勢力，運用政治手段，將封建貴族完全打碎了。戰國末陽翟大賈呂不韋以呂易秦，身為相國，助秦統一六國，摧殘舊日貴族便是一個有力的證據。

第四種重要原因，由於新興游士的爭鳴。春秋以前，官是世官，學是世學。典章制度既為貴族所專有，學術思想也為貴族所壟斷，一般平民不得與知與聞。但一到春秋，因以上種種原因使封建制度動搖之後，便有各種新興游士相繼起來爭鳴，都想提出一種新主張，改變當時混亂的局面。最先開游士之風的有名人物，當推孔子。孔子一面講學，有徒三千，一面游說，干君七十二。他的出身，原是一個沒落的貴族。他所提出的主張，關於禮的方面，雖帶有保守封建的采色；而關於仁的方面，又有解放平民的意味，大不利於貴族。其後相繼而起的游士，如墨子往來大江南北，鉅子偏於宋鄭齊間；

如孟子「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如「許行之徒數十人，捆屨織席以爲食」；其他如法家、兵家、陰陽家、縱橫家等也各挾主張，游說諸侯。他們的主張都重在改造現狀；他們的企圖都在以布衣而爲卿相；他們的才能也都勝過列國行將沒落的貴族。於是他們的聲勢，遂駕貴族而上之。列國欲圖強爭存的君主，不得不競致游士與以將相之任。甚至降貴紆尊，以養士鳴高，如戰國四公子之流。當時游士見重於各國的情形，蘇軾曾敘述如下：

春秋之末，至於戰國，諸侯卿相皆爭養士。自謀士說客，談天雕龍，堅白同異之流，下至擊劍扛鼎，雞鳴狗盜之徒，莫不賓禮。靡衣玉食，以館於上者，何可勝數！越王勾踐有君子六千人，魏無忌、齊田文、趙勝、黃歇、呂不韋皆有客三千人。而田文招致任俠姦人於薛，稷下談者六千人。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皆致客無數。下至秦漢之間，張耳、陳餘號多士，賓客廝養皆天下豪傑。而田橫亦有士五百人。其略見於傳記者如此。（見東坡志林）

這般游士多是當時知識階級的精華。他們進身的手段，多採擁護一個大貴族以打倒其他一切貴族。他們之中，以法家兵家和縱橫家最合當前的需要和國君的心理。故在戰國雖有百家爭鳴，